

玉林市文史資料

第八輯



政协玉林市委员会办公室编

玉林市文史资料

第八辑

政协玉林市委员会办公室编

一九八四年十一月

目 录

转载	大革命时期鬱林县农民运动简况	
中共玉林市委党史办公室(1)	
	1926—1927年兴业县的农民运动	
中共玉林市委党史办公室(12)	
	大革命时期的点滴回忆梁德焕(21)
	怀念黄辛波同志二三事梁诗光(28)
	革命烈士黄辛波事略黄烈得(34)
	黄辛波同志被捕前后陈 韶(46)
	地下党在广西学生军中的活动点滴杨美颤(63)
	回忆省鬱中的学生运动周 霖(69)
	鬱林游泳池惨案始末记周擎天 杨美颤(74)
	鬱林群生书店陈业怀(80)
	清末到解放前鬱林城的书店和图书馆陈衍英(87)
	清末到解放兴业县中西医发展概况陈景辉(93)
	解放前鬱林单车及零件产销概况周践漠(98)

- 元地村的毛巾手工业 姚光祚 姚光述 (107)
覃震声烈士史实片断 编辑室 (109)
玉林市境内的几处古城遗址 陈彦久 (115)

补充订正

- 《老彭兵变》的补充点滴 庞益龙 (123)

大革命时期鬱林县农民运动简况

中共玉林市委党史办公室

在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的一九二五年至一九二七年期间，我县农民团结在犁头旗下，奋起与地主阶级进行坚决的斗争，在全县范围内开展了一场轰轰烈烈的农民运动。

农民运动的兴起

一九二五年一月，中国共产党在上海举行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指出了无产阶级领导权和工农联盟的重要性，并制定了开展群众运动的计划。农民运动首先在广东蓬勃兴起，不久广东的革命浪潮很快就进入了广西。

一九二六年三月八日，国民党广西省执行委员会农民部正式成立，同年十一月苍梧道办事处成立，在苍梧道办事处的直接领导下，各县的组织机构也随之成立，我县于冬末春初成立了鬱林县国民党农民部，农民部部长由苏乐三担任，并有一批人被派为农民运动工作人员。这一年十月，省农民部还派出农民运动特派员到各县指导农运工作，派到鬱林的有李赤雷（平南县大新人，1926年在梧州宣传员养成所学

习，后被选为广州农讲所第六届学员），梁君荣、廖光华三人（据查仅李赤雷一人到鬱林活动，其余情况不清。）在筹备和成立农民协会的阶段，我县党员同志朱锡昂、张第杰、杨第鶴、王懿仁（1926年下半年考入黄埔军校）利用国民党的名义，深入乡村积极进行宣传组织活动。省立二高中校长朱锡昂常利用晚间深入乡间向农民宣传，他还把二高中的一部分青年学生组成宣传队，利用星期日分赴城区附近的村庄演说，宣传成立农民协会的意义，宣传三民主义，宣传打倒土豪劣绅，实行二五减租的道理。当时在县立樟木第二小学任教的张第杰同志，被委为农民运动名誉干事（张上达回忆材料）他利用各种机会向群众宣传，积极领导和组织该地农民协会进行了一系列的斗争。

一九二六年十一月，农民运动特派员李赤雷到鬱林指导农运工作，他常到樟木、茂林等地活动，在组织农民协会的同时，还组织了泥水、木匠等工会，促进农民运动的迅速开展。在这一时期，县农民部长苏乐三和农运工作人员黄海文、卢世芹、周燊、梁一鸣、蒋亦义等常往各乡村开展活动，在充分的宣传鼓动下，一九二六年冬，一些乡村正式成立了农民协会，成立较早的有垌口乡、新定乡、竹尾乡、金谷乡、罗冲乡、调马乡（李赤雷日记载：十五年十二月十日成立）金鼎乡（十二月十一日成立）接着各地乡村的农民协会也纷纷成立，农民协会组织很快遍及了全县的村村垌垌，到处一片沸腾。至一九二七年春，全县已成立乡农民协会三十一个，会员人数二千左右，（据1927年3月广西省农民部的报告）涌现了一批敢于领导农民与地主进行坚决斗争的骨干人物。如罗冲的张哲群，调马的李学超、李哲才、金谷的梁

丽生、梁育英、沙井的梁寿天，和睦山杨锡堂，竹尾钟美南和新定李少海等。各乡农民协会成立后，曾在县党部召开了七日由各乡农会负责人出席的会议，朱锡昂同志到会讲了话。这次会议对农运骨干进行了培训。（新桥朝荔乡农民协会负责人李志明回忆）

成立农民协会是农民的一件大喜事，各乡农会成立时都分别在各乡村作为会址的宗祠或庙宇召开成立大会，会上选出农民协会的领导机构，由执行委员，委员，秘书和纪律裁判委员组成，农会会员要履行入会登记、缴交会费，领取会员证等手续。不少农会给予入会会员每人发一顶桐油笠或篾丝笠，笠上写着“××乡农民协会”。各农会还购置锣鼓、洋号等宣传用品，每逢游行或集会都敲锣打鼓去参加。在成立农民协会的乡村，其中一部分组织了农民自卫军，自卫军的任务主要是防匪防盗，保卫农民政权，有时利用晚间持枪放哨保护农作物（如罗冲、新定、金华、大双等）。有的农会办起了农民夜校（如江岸）教农民识字唱歌学文化，有的农会还投资开办合作社（如小平山金华，南江扫杆岭），合作社经营的是一些日用什物，以方便当地的农民群众。

除各乡村成立乡农民协会之外，一些区还成立了农会领导机关，樟木区成立了二五减租建设委员会，由张哲群、李学超等五人组成，领导该地的二五减租运动。新桥、茂林、小平山等区也成立了相应的组织，对各乡农民协会进行具体的指导，使全县农民运动迅猛开展。

犁头旗是农民协会的重要标志，凡经上报审批的农民协会，上级均颁发有犁头旗和印章，并写有“鬱林县××区××乡农民协会”，在这些农会中，有相当一部分是在我党领

导下的群众广泛发动战斗力强的农会，如罗冲、调马、金谷等。但也有一些是土豪劣绅以假乱真鱼目混珠的假农会。如金鼎乡农会就是以李济沾为首的一伙土豪劣绅组成的，他们口头上也喊二五减租，背地里却暗暗把收租的斗加大，借着农民协会的名义保护他们的利益，所以贫苦农民一个都不参加他们的假农会，又如旺瑶乡农民协会成立后，该村劣绅杜萃堂煽动其杜姓人企图另成一个农会与之对抗，后因报县审批时受到制止不得逞。成立农民协会并不是一帆风顺的，卖酒区土豪劣绅钟发香在组织农会期间大造谣言，企图破坏农会，垄断乡政，鱼肉人民，散布什么“入会是做人家的走狗，将来一定调你去北伐的，并且按民抽税”。又说“你如果入了农会，日后必有大祸，到了有事时我一定不共你理，识者就不入农会了，你们入农会就是拜会做贼啦”。钟发香见造谣煽动不生效，又唆使爪牙钟星堂，钟天养、钟以民等明目张胆地宣称要与农会决一死战，将农民协会所贴省党部及各处发来的布告传单全部撕毁，并指使其走狗冯万春将入农会会员的租耕田尽行易耕，尽管土豪劣绅百般抵制，也阻挡不了这场波澜壮阔的农民运动。

轰轰烈烈的二五减租运动

二十年代的广西，贫苦农民深受地主阶级的压迫剥削，要改变这种穷困的现状，首先必须进行减租斗争。当时的佃租一般分为三种：一种是实租，也叫“铁板租”，不管丰年灾年，佃户一定要按规定的租谷交租；另一种是浮租，原先定有一个较高的租额，收获时根据年景好坏由双方协定加减

若干成；再一种是临田分禾，每造收割时，在田中将湿谷平分，各得一半。这几种租，实租和分禾减租较易进行，而浮租则困难较多，地主往往把租额拼命抬高，从中钻空子。二五减租即是在原租谷中减去百分之二十五，这是农民协会与地主开展斗争的主要内容，是一场冲击封建势力的经济斗争。

各地乡村农民协会成立之后，接着就开展了轰轰烈烈的二五减租运动。农民协会首先是举行示威游行大造声势，发动各学校师生紧密配合，也有一部分农村妇女参加，组织浩浩荡荡的队伍撑着犁头旗，敲锣打鼓到城区，圩镇以及各村庄巡游宣传，游行不断高呼口号“打倒土豪劣绅！”“打倒贪官污吏！实行二五减租！”还高唱“打倒列强除军阀！”等歌曲，口号震天，歌声遍地，使地主豪绅闻声丧胆，和睦山农会在杨锡堂的带领下曾两次组织一百多人敲锣打鼓到州背减租，茂林沙井乡农会也常组织巡游减租，并将所减的租谷百分之二十归佃户，百分之五归农会。沙井和龙安的旺塘等农会还修建了农民仓。全县农民协会的二五减租搞得热火朝天，势不可挡。

一九二七年上半年，各地村庄都普遍开展了二五减租，在减租过程中，由于农民协会威信高，声势大，地主豪绅一般不敢逆动，能够循规蹈矩给农民减租，而另一部分恶霸地主则顽固抵赖，不愿减租。对不法地主的抵抗行为农民协会展开了针锋相对的斗争。一九二七年夏，城区农民要求郑、周两家地主减租，他们恃着自己的势力进行抵赖；官僚地主周建端甚至要把租给农民耕的田收回；下街地主龙鸿轩勾结贪官污吏强迫农民退田。反动地主的不法行为，激起了农民的愤怒，他们联合起来，分别和这些不法地主进行坚决的斗

争，迫使这些家伙不得不向农民低头，只好按规定减租把收回的田地交给原耕农民。

当时，我县农运斗争最为活跃的是樟木地区。该地自称天字第一号的土皇帝庞荣秋，串连部分地主与农民协会相对抗，不肯减租给农民。为了打击庞荣秋的嚣张气焰，在县立樟木二小任教的共产党员张第杰同志发动各乡农民协会对庞荣秋给予狠狠打击，组织游行队伍包围庞荣秋的庄园，高呼“打倒土豪劣绅！”“打倒庞荣秋！”“实行二五减租！”并准备把庞荣秋捉来游街示众。由于庞荣秋早已闻讯逃跑，农友们便想出一条计策，让樟木圩宁屋一个叫盲二的瞎子装扮成庞荣秋，给他戴礼帽，穿长衫、戴眼镜，俨然一个土豪劣绅的样子。游行时瞎子以庞荣秋的身份自白道：“我姓庞，名荣秋，平时对农民百姓压榨勒索，罪恶极大，现在我出来游行示众向大家道歉认罪……”。农民协会就是采取各种各样的斗争方式，巧妙地与地主进行斗争的。小平山的金华，卖酒等乡的农会，在游行时也是叫人扮成土豪劣绅，拿着斗和秤去示众，揭露地主剥削农民的罪行。这些妙趣横生的活报剧，气煞了土豪劣绅，反动豪绅地主威风扫地。

正当二五减租在全县搞得如火如荼的时候，卖酒区又出现一则闻名全省的抗租事例。一九二七年夏收临田分禾时，卖酒区周村肚地主钟绍文违抗二五减租，他不但不听农运工作人员的劝告，反出恶言说：“你几文钱妄想来吓我减租，要我减租一厘不减。”不法地主钟绍文这样嚣张，农民协会采取了强有力的措施，将其拘押并报省执行委员会处理，最后判处钟绍文除将其浮租取消与佃农订定实租额之外，还罚款五百元，并限其交清罚款。钟绍文以鸡蛋碰石头的行为，

说明了土豪劣绅的愚蠢，也暴露了反动阶级的本性。对钟绍文的严厉处罚，充分显示了农民协会的无比威力。

农民运动的高涨

随着经济斗争的不断发展，政治斗争便愈来愈烈，各乡农民协会的斗争情绪也愈来愈高涨，形成了一股汹涌澎湃的斗争浪潮。

一九二六年冬，茂林区金谷乡农民协会成立后，曾联合各乡农会组织游行队伍对该乡鹅颈岭的豪绅地主曾春林进行示威斗争，包围地主庄园高呼口号。曾春林等一伙豪绅图谋报复，串同陆川平乐一带的地方军阀吴暮寒，于十一月二十七日（见李赤雷日记）带兵焚毁金谷乡农会会址雷祖庙。对反动豪绅的疯狂进攻，广大人民十分气愤，忍无可忍。金谷乡农会执行委员梁丽生以农民协会的名义告状，要求清算土豪劣绅曾春林一伙的罪行，结果上级执行委员会对鹅颈岭豪绅进行严肃处理，重罚曾春林一伙赔款，并罚其重新修复农会会址。待会址修好后，金谷农会又敲锣打鼓出县城游行，庆祝这次击退土豪劣绅进攻的胜利。

在农民运动不断深入发展的时候，我县爆发了破天荒的农民万人大请愿。一九二七年春，樟木调马乡发生了水利纠纷。该乡前人修筑的太平桥水陂灌溉面积为五百多亩，每年收入水费谷五十多石（每石140斤），当地豪绅地主对这项巨大的收入红了眼，便假称集体修理困难，杏村地主庞绍初等人合股侵吞了此项收入。调马乡农会成立后，建议把陂堰交农民协会管理，以扩充学校和农会的费用，但庞绍初等人

顽抗抵赖不肯退交，至二七年农历正月中旬，农会委员兼学校校长李学超发动调马村农民去修塞陂堰，放水灌溉，庞绍初亦煽动该村一百多人出来准备械斗，但调马农民不管他，使庞绍初无从下手。于是，庞绍初便施行毒计，将该村庞五打至重伤后，诬告为调马农民所打伤，并诬指打人凶手是李八。庞绍初即上诉县府，兼用金钱收买司法官温慈祥。贪官污吏不问青红皂白，硬将李八逮捕入狱。

为了击退反动统治阶级对农民运动的进攻，我县党组织及时领导人民进行斗争。于三月二十九日发动组织了以农民为主，并有工、商、学各界群众参加的一万多人的请愿队伍，举行了声势浩大的农民大请愿。各乡村的游行队伍每人手执一面写有标语口号的三角纸旗，披起蓑衣，戴着笠帽，顶寒风冒冷雨，敲锣打鼓从四面八方云集县城。请愿队伍按部署先在大府园集合开会，然后由张第杰同志为代表，率领队伍走到县府衙门前，一瞬间，伪县府门前人山人海一片沸腾。张第杰同志首先登台讲话，要求县知事吴祖谋出县府门前向请愿群众道歉，并当众释放被押农民李八，接着高呼“打倒贪官污吏！”“打倒吴祖谋！”“打倒温司法！”等口号。吴祖谋闻讯后非常恐慌，被迫打开中门亲自迎接请愿群众（按当时的规矩，只有在县官迎接上司时才开中门），在巨大群众压力面前，吴祖谋仍欲无理狡辩，把责任推给司法官，但温司法早就闻风而逃了。在无可奈何的情况下，吴祖谋只好接受请愿条件，让李八站到台上由吴祖谋亲自打开脚链，并烧炮竹赔礼道歉，给被押者挂红。最后太平桥水陂判归调马乡农民协会，原告者庞绍初被罚款赔偿。调马乡农会为了庆祝这次斗争的胜利，特将庞绍初的赔款买了一堂锣鼓作为宣传工

具。从此，李八便得了一个“洋鼓八”的美名。

这次破天荒的农民万人大请愿，是我党领导农民斗争的重大胜利，广大人民无不为之称快，消息很快传扬四方。

农民运动发展十分猛烈，斗争连绵不绝，土豪劣绅处处受打击，这一年春天，樟木地区还发生了西安夺枪事件。当时西安团务局存放有一批长短枪枝，并豢养有二十多名练勇，由局董庞荣秋，副局长董何树屏统率。樟木农民自卫军成立后，以农民自卫军的名义向西安团务局交涉，要该局把所有武器交给农民自卫军，但都为该局所拒绝。为了夺取这批武器，张第杰同志召集各乡农会领导人到樟木二小商量对策。计策决定后，一部分农民和张上达（二小学生）带领几十名学生，在樟木二小集合后，以游行的名义列队向西安团务局突然进袭。队伍到达西安团务局时，便一齐冲入去撬开存放枪枝的仓库大门，把全部枪枝搬走。这突如其来的行动，使该局官兵一个个惊惶失措，目瞪口呆不敢吭声。

这一时期农民运动的广泛开展，一系列尖锐激烈的斗争，沉重地打击了土豪劣绅反动势力，激励了广大人民与统治阶级不断进行坚决的斗争。

农民运动转入低潮

一九二七年“四·一二”事变发生，不久，广西也实行清党反共，中国的天空一时乌云密布，使各地的农民运动受到极大的摧残。

在蒋介石反动派的指挥棒下，一切反动势力都重新抬了头。在我县党组织尚未暴露的情况下，敌人只能捕风捉影，

四出搜捕。为逃避白色恐怖，我县党组织负责人朱锡昂被迫辞去二高中校长职务，转往上海、广州等地活动。在县党部工作的进步青年卢世芹（准备留苏学生）后来被反动派残酷杀害。我党一些同志被捕入狱。以庞荣秋为首的土豪劣绅勾通一气，实行反攻倒算，报复农运斗争的领导人，诬告张第杰同志发动农民大请愿是聚众“包围县府迫胁官厅”，于是，反动政府便逮捕了张第杰同志。张第杰在群众的支持下，以牙还牙反告庞荣秋等豪绅欺压百姓，鱼肉乡民。因此案在鬱林无法处理，后来又把张第杰解押南宁囚禁。反动派把张第杰关押半年之后，只好宣布无罪释放。

在一片白色恐怖之下，反动地主狐假虎威，猖狂活动。卖酒土豪劣绅钟发香，钟绍陶籍清党之机指使走狗钟胜堂勾结各村土豪劣绅于六月七日（农历五月初八）在周村肚公然召集三四十人参加的会议。这次会议一连开了五、六天，会上制定了一系列决议案，首先谋划屠杀该区农会梁铭功，梁志恒等数人及各乡农民协会积极分子，后因屠杀不到则向省政府控告梁铭功等为共产党，使他们不敢再做农运工作。各地土豪劣绅也趁机变本加厉地压迫勒索农民，不少二五减租取得很好成果的乡村，在地主豪劣绅的嚣张气焰下，被迫退还二五减租所得的全部租谷。有的佃户则宁折不弯，被地主收回租耕田。马岭村农民不肯退还二五租，反动地主在秋收时便带人到田里将刚收下的稻谷抢走，还强行抢走了六只谷桶。凡是成立有农民协会的地方，反动政府都派出爪牙四处搜捕“农民头”（即农民协会负责人），搞得村村峒峒鸡犬不宁，人心惶惶。一些被追捕的农协会负责人只好背井离乡，外逃谋生，有些躲避不及的被捕入狱。有一批农运骨干后来

被反动派枪杀。如茂林金谷的梁丽生、梁育英，沙井的梁寿天，扫杆岭的文诗才，樟木的辛荣斋、张锦才、罗业礼、罗九等，他们的鲜血洒进了祖国的原野。

至此，各乡村的农民协会在反动派的屠刀下无形中解体了。曾一度轰轰烈烈的农民运动在白色恐怖下转入了低潮。

农民协会是在第一次国共合作形成以后以合法的地位出现的，运动开展之广，声势之浩大，在我县是前所未有的。这场运动之所以能够形成滚滚洪流，是与我党组织的秘密领导和紧密配合分不开的，它是我县革命斗争的组成部分，在鬱林革命史上将永放光彩。

一九八三月八月

1926—1927年兴业县的农民运动

中共玉林市委党史办公室

孙中山先生逝世后，在国共合作形势下，我党一如既往，领导全国各地人民，团结各民主阶层，开展了一场轰轰烈烈的大革命运动。

一九二五年夏，中共两广区委（原址：广州市文明路75—77号）先后派了几批共产党员和共青团员来广西宣传马列主义、组织发动工农群众。开展工农运动。不久，建立中共梧州地方委员会（后改广西特委）领导广西的工人运动和农民运动，掀起了反帝反封建的革命高潮。

一九二五年冬，两广区委通过国民党中央农民部派共产党员林培斌、李植华、罗瑞贤、谢铁民和中央宣传养成所学员陈芝颖等以中央农民部特派员身份到梧州，成立“中央农民部特派员驻梧办事处”，并由广西地下党的派遣，分赴各地发动群众，建立农民组织，推动农民运动的发展。

一、农民运动和革命思想的传播

（1926年3月～1926年10月）

一九二六年三月，我党领导在各地建立农运组织的时候，国民党广西省执行委员会农民部函派梁权（现玉林县城

隍公社胡村大队人，解放后已镇压）、庞天钧（现玉林县石南公社凤山大队人，已故）、陈仲谋（又名陈敏聪现玉林石南公社东山大队人，已故）、李延祺（现玉林县石南公社枫平大队人，已故）、吕光球（玉林县大平山公社人，已故）为兴业县农民运动名誉委员。但由于梁权是军阀李宗仁驻兵兴业时资助李宗仁东山再起的土豪劣绅，是代表兴业士绅、地主阶级利益的。他们把持、操纵农民运动的领导权，得不到广大人民的支持和拥护，起不到农运应有的作用。

一九二六年春，梧州宣传养成所学员陈仲强（又名陈炎现在玉林县石南公社东山大队人，解放后赴港）、庞斩夷（又名庞佑声，现玉林葵阳公社旧城大队鸦道岭人，已故）彭河（又名彭伯伟，玉林县葵阳公社铁城大队人，已故）等回兴业。在伪县府自治局和黎昭常等成立“兴业县独立区党部”的同时，组织兴业县农民建设委员会开展农民运动。七月，共产党员庞大恩（现玉林县葵阳公社新荣大队人，1925年入党，1937年3月牺牲）从日本回上海党中央工作期间回兴业家乡。兴业县农民建设委员会常委黎昭常等得到大恩同志的正确指导，他们曾一起深入农村、学校宣传农民革命运动。庞大恩不但与他们到木根圩养正学校和附近一些乡村宣传发表演说，组织清算兴业县府账目，揭露官绅的罪行，还经常利用晚间在大贺村卢氏宗祠和万寿木根同贫苦农民谈心，许多贫苦乡邻和兄弟叔伯也经常到他家里，听他介绍国外见闻和宣传打倒土豪劣绅，铲除贪官污吏，实行减租减息等口号和主张。他还到兴业中学给学生介绍新思想、新文化、新科学知识，曾邀请进步学生吴业昂（又名吴光华，现玉林县城隍公社枫睦大队人，解放后曾任广西艺术学院党委